

从量词看“NP的VP”结构的本质

杭州师范大学 叶 狂

提要:“NP的VP”结构内部呈动词性、外部呈名词性这一现象一直是难题,学界争议不断,未有定论。本文从句法共性视角观察,发现了大量带量词的该类结构,如“这本书的两次出版”、“她的这种不见记者”,由此提出量词是解释该结构的关键:量词“种”、“次”等选择VP做补足语,量词具有名词性,因而整个结构呈名词性,同时,VP的动词性质并没有改变。当限定词、数词、量词为隐性时,就形成“NP的VP”结构。句法上,有显性量词和有隐性量词的结构是同一结构。从跨语言对比的角度看,量词选择VP,类似于英语的-ing选择VP,都是对VP的名物化操作。英语形态发达,用语缀-ing;汉语量词发达,则用量词。量词这一功能并非特设,至少有四个方面的独立证据。本文的分析既在理论上优于前人提出的五种方案,也能更好地解释跨语言共性和差异。

关键词:向心结构、名物化、名词性短语、限定词短语

[中图分类号]H14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429(2020)01-0064-13

1. 引言

现代汉语“NP的VP”结构,比如“这本书的出版”,一直是学界难题,因为该结构的内外性质不一致:内部呈动词性,可受副词修饰(如“这本书的曾经出版”),可以否定(“这本书的不出版”),还可带宾语(“商务的出版这本书”)(沈家煊 2016: 66);而外部却呈名词性,只能做主宾语、不能受副词修饰、不能做谓语(朱德熙 1980: 208)。这种矛盾可用图1表示:如果主张V是结构核心,那么其最大投射应该是VP,但“这本书的出版”却是名词短语 NP_1 ;如果认为V能投射出NP,则违反了向心结构原则(Bloomfield 1933)。针对这一难题,前人做了大量探索,主要提出了五种解释方案。下面先作一简要评介,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新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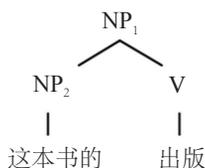


图 1. “NP的VP”结构难题

2. 前人的解释方案

第一种方案认为动词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变成了名词,如“转成名词”(黎锦熙 1924)、“活用为名词”(吕叔湘 1943)、“变性”(吕叔湘、朱德熙 1952)、“变位”(曹伯韩 1954)、“名词化”(史振晔 1960)、“动词名用”(吕叔湘 1979)、“活用为动词”(张静 1980)、“在性质上向名词临时转移”(邢福义 1980)、“动词类名词性”(陆丙甫 1985)、“兼有名词功能”(陈宁萍 1987)、“干脆说是名词性的”(施关淦 1981),等等(详见范晓 2009: 184-185)。

第二种方案要修改向心结构理论。针对第一种方案,朱德熙(1980: 193-224)认为“NP的VP”中的动词没有变成名词,但整体结构确实是名词性的。朱先生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可能要修改向心结构理论。朱德熙(1984)提出了“双核心”说,比如“我的书”是双核心,“我的”和“书”都是核心,“我的”可以与“书”同指。但朱先生同时又认为双核心也不好解决“NP的VP”结构难题,因为“NP的”不能指VP。

第三种方案主张语义名物化(nominalization)。胡裕树、范晓(1994)在“三个平面”语法观下,认为V虽然在句法平面没有变化,但在语义平面发生了名物化。他们认为汉语的名物化是与名词化分开的,而英语、俄语等语言的名物化与名词化是对应的。但问题是离开了句法证据,我们就无法确定语义名物化是如何发生的、发生后是什么样子的。

第四种是把“的”分析为核心的功能范畴观。司富珍(2002, 2004)、陆俭明(2003)发现前人在动词上找出路面临困境,于是提出以“的”为中心的功能核心说。司富珍(2004)认为“的”是“这本书的出版”的中心语,“的”具有[+N]特征,“这本书”是指示语,“出版”为补足语。这样“出版”依然是VP,“的”插入后使“这本书出版”整个结构发生了性质变化,从[+V]变成了[+N]。周国光(2005, 2006)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他认为没有独立证据能证明“的”具有[+N]的语义特征。邓思颖(2006)、李艳惠(2008)、潘海华、陆烁(2013)以及陆烁、潘海华(2013)等也都不支持“的”为中心语的分析。

第五种是空范畴观。代表研究有熊仲儒(2001, 2005)、石定栩(2004,

2008, 2011: 36) 等。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既然动词性质不变, 而“NP 的 VP” 又是名词性, 那么, 一定有某种机制让这两者同时成立。对照英语的 -ing 名物化方式, 并参考汉语缺乏形态这一事实, 学者们就提出汉语也有一个类似英语 -ing 的名物化手段, 比如可以记为 n, 但有可能语音形式为空。黄正德 (2008) 在讨论伪定语结构“你教你的英文” 时, 也使用了一个空的名物化短语 (Gerundive Phrase)。然而, 空范畴观有两个缺陷无法解决: 一是无法找到其他独立证据来证明汉语确实存在一个空的、没有语音的且永远不会显现的名物化手段; 二是难以说明儿童在母语获得时, 是如何学会或掌握这个“无形” 工具的。

总之, “NP 的 VP” 结构难题给汉语句法研究带来了挑战, 前人提出的五种方案虽然加深了人们的认识, 但都存在问题。那么, 该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 我们在句法共性视野下, 发现这一现象其实与汉语的量词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 “NP 的 VP” 本质上其实是“NP 的 + 限定词 + 数词 + 量词 + VP” 结构, 前人都没有重视带量词的结构, 因而忽视了量词在其中的作用。一旦发现二者的联系, “NP 的 VP” 结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3. 本文的方案

如果我们把名物化视为一种跨语言通用的句法共性操作 (叶狂 2014), 英语使用语缀 -ing 来实现, 如图 2 所示: -ing 是名物化核心, 投射出 NP, -ing 选择 VP 做补足语, -ing 附缀到动词上, 就形成了 John's singing the Marseillaise。那么, 汉语使用什么来名物化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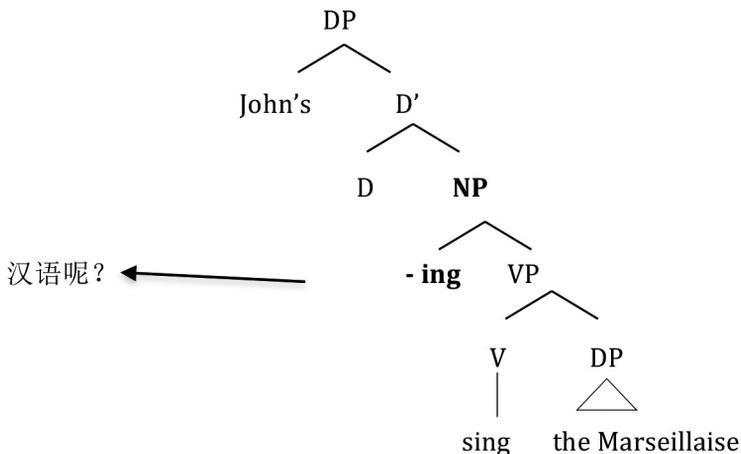


图 2. 英语的名物化结构 (Abney 1987: 142)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汉语起到类似于 -ing 功能的并不是无语音内容的空范畴,而是实实在在的量词,现代汉语有大量的相关语言事实。根据朱德熙(1982)、郭锐(2002)对量词的分类研究,加上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表现出名物化功能的量词主要有名量词“种”、“份”、“个”等,如例(1)、(2);动量词“次”等,如例(3)¹。相对而言,“种”、“次”的使用频率较高,适用范围也更广一些,“份”、“个”较少,例如:

- (1) a. 我觉得她的这种自觉的切断叙述非常不同于普通的渴望倾诉的中国女人²。
 b. 我们不能不佩服凤姐的这种即兴地发挥。
 (2) a. 为了坚持自己的这份孤傲,她也的确失去了许多次机会。
 b. 她无时无刻不在切盼自己的那份重新获得。(铁凝《玫瑰门》)
 (3) a. 印象较深的是章太炎的两次被囚。
 b. 为啥我今天的两次炖排骨肉都老的不行呢。
 (4) a. 我赞成她的这种不见记者。(石定栩 2004: 262)
 b. 我赞成她的不见记者。

例(1)-(3)中量词后的成分都是动词性结构。如(1a)中的“切断叙述”是动宾短语;(1b)中的“即兴地发挥”是状中式动词短语。(2a)中的“孤傲”是形容词;(2b)中的“重新获得”是状中动词短语。(3a)中的“被囚”是被动结构;(3b)中的“炖排骨肉”是动宾短语。例(1)-(3)的量词连同限定词或数词都可以隐没不出现,虽然这会造成语义上的一些变化,但却不影响句子的合法性,如例(4)所示。

换个角度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带量词的结构才是“NP 的 VP”的本来面目。结合 Abney (1987) 的 DP 理论,参考 Pan (1990, 1998)、Tang (1990)、Cheng & Sybesma (1999, 2005)、程工(1999)、潘海华、安丰存(2012)等对汉语 DP 结构和量词的研究,我们认为“NP 的 VP”的完整结构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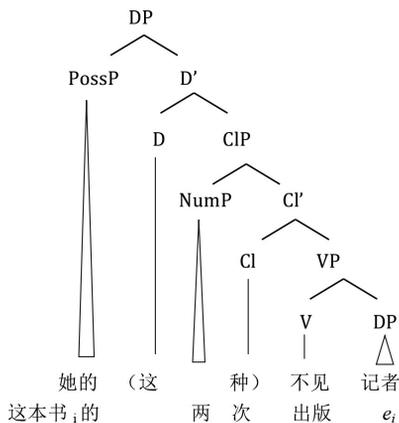


图 3. “NP 的 VP” 的句法结构

以“她的(这种)不见记者”为例:整个结构是限定词短语(Determiner Phrase, DP),“她的”基础生成(暂称其为领属短语 possessor phrase, PossP),“这”生成于限定词核心,“种”生成于量词核心(Classifier, Cl),选择VP“不见记者”做补足语,“不见”生成于V处(暂不讨论“不”的生成),“记者”生成于V的补足语DP处。“这种”、“那次”等实际都隐含着数词“一”(郭锐2002:202),当数词短语(numeral phrase, NumP)显性出现,就会形成“这一种”、“那两次”等结构。当“限定词+数词+量词”都隐性时,就形成表面上的“她的不见记者”,但完整结构还是如图3所示。“这本书的两次出版”作类似分析。略有不同的是,“这本书”要控制“出版”后的空位e。语义上,“这本书”解读为“出版”的宾语。

这一结构的关键就是主张量词(动量词、名量词)可以选择VP做补足语。先讨论动量词“次”。有两条证据。一是Zhang(2017)认为动量词可以选择动词短语做补足语。她把动量词分为事件外和事件内两种。“次”、“回”、“遍”、“趟”、“顿”都是典型的事件外量词,“拳”、“枪”、“下”等都是事件内量词。事件外量词可对整个事件进行计量,选择vP做补足语,事件内量词选择VP做补足语。量词可允准动词短语省略,如(5)所示。

(5)大林曾经三次迟到,玉如两次~~迟到~~。(同上:276)

二是按照潘海华、叶狂(2015)和叶狂、潘海华(2018)的同源宾语观点,在很多表达式中,动量词后面看似带了一个名词短语,但实际是一个动词短语,例如(6a)中的“三次上海”实际是“三次去上海”。(6a)在句法上是同源宾语结构,经语音层互补删略生成了表层句子,如(6b)所示。郭锐(2017)也持类似看法,但在生成方式上稍有不同。他认为只拷贝动词到DO位置,然后删略原位动词,可例示为(7a-b)。总之,出现在“NP的VP”结构中的动量词“次”与例(5)-(7)中的动量词性质相同,可以选择一个VP做补足语。

(6) a. 张三去了三次上海。

b. 张三[去上海了][三次[去上海]]。

(7) a. 张三[DO了[三次去上海]]。

b. 张三[去了[三次去上海]]。

再看名量词,主要讨论“种”。“种”一般选择名词做补足语,但“种”表示的“类别”意义比较模糊甚至抽象,适用于具体名词,也适用于抽象名词或事件名词,如“两种人”、“一种观念”、“三种比赛”。事件名词实际与动作事件在语义上并没有多少区别。这样看来,“种”进一步发展,选择动词短语做补充语也不足为奇。这里举“各种”作为旁证。“各种”后通常带名词短语,如“各种人”、

“各种事情”，但我们发现“各种”后也可以出现动词短语，而且大量使用，如(8)所示。(8a-d)中划线部分可以概括为“NP的+各种+VP”结构。有两种分析法，一是把“各种”看作一个词化了的词(但《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尚未收录)；二是看作“各+种”，因为“各”的组合能力很强，如“各家”、“各学校”、“各派出所”等，都不是词。按照后一种结构，“种”显然选择了动词短语做补足语，划线部分就是“NP的VP”结构。

- (8) a. 就像多年来擅于排除计算机程序中的各种不合逻辑。
 b. 忽然想到去年的各种上医院~各种心酸。
 c. 假日的各种懒、材料的各种不全。
 d. 再加上文档的各种不兼容，死活试不出来咋用了。

如果以上我们对“次”、“种”的论证是对的，那么，在“NP的VP”结构中，量词选择VP后，整个结构形成了以量词为核心的量词短语CIP，其内部VP的动词性不变。CIP又做限定词的补足语，形成完整的DP结构。严格地讲，限定词D负责指称性或有定性(参见Huang *et al.* 2009: 296)，整个结构的名词性来自量词CI。量词天然具有名词性，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例如朱德熙(1982)就把量词归入体词内，因此，量词本身就具有[+N]的特点。这样，在此结构下，“NP的VP”内部的动词性、外部的名词性这二者的来源就清清楚楚，“NP的VP”的结构难题因此得以妥善解决。

这里必须要明确一点，我们所说的“量词不出现”是指隐性存在，不是完全没有。具体讲，我们认为“NP的VP”结构中一定有隐性的量词存在(用 \emptyset 表示)，因此与有显性量词的表达式是同一结构，例如“这本书的出版”与“这本书的这一次出版”结构完全相同，如(9a-b)所示。虽然隐性与显性在语义上会有区别，但句法结构完全相同。当然，量词的显性实现不是任意的，它要与VP事件语义匹配。比如“一次出版”合法、“*一份出版”不合法。量词的隐性也不是任意的，如果隐性造成不合法，比如“*她的这不见记者”、“*这本书的三出版”，这时量词必须显性出现。

- (9) a. $[_{DP} \text{这本书的 } [_{D} \emptyset] [_{CIP} \text{NumP } [_{CI} \text{CI} \emptyset] [_{VP} \text{V 出版}]]]]$
 b. $[_{DP} \text{这本书的 } [_{D} \text{这}] [_{CIP} \text{一}] [_{CI} \text{CI 次}] [_{VP} \text{V 出版}]]]]$

我们主张“NP的VP”中有一个隐性的量词，而且它可显现为“种”、“次”等，这一论证方法绝非特设，而是有大量的先例可循。比如Huang *et al.* (2009: 296)就认为“三个人”作为一个名词短语而不是数量短语的时候，结构上就是个DP，其中D为隐性，也可以实现为“这”、“那”等，如图4所示。语义上，隐性与显性当然也会有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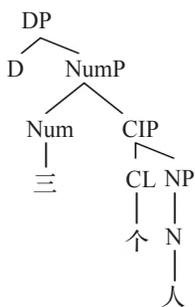


图 4. 名词短语“三个人”的结构

Carnie (2013: 372-373) 在论证英语关系从句的结构时,认为其中一定存在一个隐性的算子 (Operator), 而且要移位到 CP 的指示语位置, 如 (10) 所示。虽然在现代英语中, 这个算子不能显性实现, 但在英语的早期变体中却可以实现为 *which*, 可以与标句词 *that* 共现, 如 (11) 所示。不仅是古英语, 巴伐利亚德语中的算子也可以显性实现为 *der* (‘*who*’), 如 (12) 所示。如果以上论证方法都正确, 那么, 我们对“NP 的 VP” 结构性质的认定就完全合理。

(10) I know I bought [_{NP} the book [_{CP} that [_{TP} you recommended *Operator*]]]

(11) thy freend *which* that thou has lorn
‘your friend that you have lost’ (同上: 373)

(12) der Hund *der* wo gestern d’ Katz bissn hod
the dog who that yesterday the cat bitten has
‘the dog that bit the cat yesterday’ (同上)

与前人的观点尤其是空范畴理论相比, 本方案至少有四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 有语言事实做依据。虽然我们认为“NP 的 VP” 结构中有一个隐性的量词存在, 但它在语义和语音上都能显性实现。因此, 这一观点是基于客观事实的分析。而空范畴理论提出的空名物化手段却永远没有显性实现, 缺乏本族语的直接证据。

第二, 符合简约原则 (沈家煊 2016: 4-8), 避免纯理论性的假设。本文的量词观没有给汉语研究增加任何理论负担, 只是发现了量词的一个新功能。实际上, 所谓的“名物化” 也是与英语比较而言, 完全可以不用这个名称。而空范畴观却由于理论需要, 为汉语新设了一个空范畴, 是额外负担。

第三, 可以解释儿童对该类结构的习得。因为量词是汉语的一个显赫范畴 (刘丹青 2011, 2012), 儿童很早就掌握了一些量词的用法 (李行德 1997: 78),

而空范畴理论无法解释儿童的习得问题。

第四,从语言对比来看,更有利于解释跨语言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以英汉语为例,两种语言的显著共性就是都选择本语言的优势系统来实现名物化。汉语选择量词,是因为汉语是量词发达的语言;英语选择形态后缀 -ing,因为英语的形态发达。这表面看似不同,实际都符合自身的功能最优化配置,具有共通性。英汉语也有差异,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否隐性存在。量词属于功能性范畴(参见潘海华、安丰存 2012),表现形式为词。句法上,功能性成分常常容许隐没。尤其当数词和限定词没有显性表述时,量词当然可以隐性。而英语的 -ing 虽然也是功能性的,但它的形式是形态语素,要附着到动词宿主上,英语的动词在句法上要出现(除非有特定情形),-ing 也一定要随之出现,因此不能隐性存在。二是能否与数词短语结合。量词英语称为 classifier,直译是“分类词”。顾名思义,量词是通过给动作事件分类的方法来实现名物化,分类就能与数词短语组合,或接受数词修饰。如“这本书的两次出版”。但英语的 -ing 是纯粹的功能语类,没有实际语义,因而不能受数词修饰(Kuno & Takami 2004: 125),如 *a criticizing the book。三是名物化对象也有所不同。Milsark (2006: 441)指出,英语的名物化结构不能有情态动词,即情态短语不是名物化的对象,如(13),但汉语却可以,如(14)。原因也很明显:(13a)不合法,因为 -ing 不能附缀到情态动词上,(13b)不合法,因为 must 必须选择 VP 做补足语,不能选择名物化短语。(14a-b)都合格,因为量词虽然是黏着词,但它是以限定词或数词为宿主(朱德熙 1982: 48),不附着到情态动词上,因此对名物化的对象没有限制。以上这些差异都是前人方案难以解释的。例(14)更是空范畴理论的反例,因为空的名物化手段既不能放在情态动词身上,也不能放在情态动词后的 VP 上,这样就会预测汉语例(14)与英语例(13)一样不合法,但事实正好相反。

(13) a. *John's musting leave was surprising.

b. *John's must leaving was surprising.

(14) a. 我说她现在的这种不能释怀其实说明了她对那个人有一种别样的、近乎于爱情的感情。

b. 鸦片烟的不能禁绝,实际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深入中国的一种表现。

4. 独立证据

本文提出的量词观不是为“NP 的 VP”结构特设,还能用来解释其他现象,兹举三例。此外,汉语选择量词来实现名物化也不是跨语言的孤例,其他语言也有类似现象,比如苗瑶语。我们把以上情况统称为“量词具有名物化功能的独立证据”。

证据一：“很多+量词+VO”格式。“很多”能直接修饰名词性成分，但不能直接修饰动宾短语。如果要修饰，则必须增加量词，如例(15)所示³：

- (15) a. 很多书 / 很多想法
 b.* 很多看书 / * 很多去北京
 c. 很多次看书 / 很多次去北京

这一事实对空范畴理论是一大挑战，但却是支持本文量词观的独立证据。具体讲，按照空范畴观，如果在“NP的VP”中存在一个空名物化手段，那么在“很多看书”、“很多去北京”中也应该存在，它不能只限于一个结构。这样，(15b)就应该是合法的，因为空范畴已经让“看书”、“去北京”名物化了，但事实却相反，(15b)不合法。如果在动宾短语前增加量词，如(15c)所示，就能受“很多”修饰了，这说明量词起了关键的名物化作用。

证据二：“有+一点儿+小(不)A/V”格式。陈一(2014)研究了汉语的“有点小(不)A/V”表达形式，例如：

- (16) a. 有点小郁闷 / 有点小伤感 / 有点小紧张
 b. 有点小下降 / 有点小促动 / 有点小增加
 c. 有点小不开心 / 有点小不愉快 / 有点小不高兴
 d. 有点小不理解 / 有点小不适应 / 有点小不相信

“有点(儿)”既可看作是一个副词，也可看作是动宾结构“有一点儿”。如果作后一种分析，陈一认为“有一点儿”句法上要求带名词性成分，形成“有一点儿+N”格式。但例(16a-d)都是“有点儿+A/V”，为什么也合法呢？陈一认为根据沈家煊(2007, 2009)提出的“名动包含”理论，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A和V当然也可以出现在这个格式。

我们认为这一分析不全面。因为如果这是对的，那么“有+小A/V”格式，如(17a-b)，也应该是合法的，与“有+N”(有钱、有信心)格式一致，但事实显然不是。说明这里不是“名动包含”在起作用，而是不定量词“点儿”起了关键的名物化作用。空范畴理论也会错误地预测(17a-b)都是合法的表达式，因为有空名物化手段让“有”后的“A/V”名物化了。

- (17) a.* 有小郁闷 / * 有小伤感 / * 有小紧张
 b.* 有小不开心 / * 有小不愉快 / * 有小不高兴

证据三：“给+NP+数量+VP”格式。《现代汉语八百词》指出“给”做动词时，一般情况下带双宾语，如“给你一份礼物”；有时第二个宾语还可以是动词、形容词，但这时必须增加数量词。例如：

- (18) a. 给你一点厉害 a'. * 给你厉害
 b. 给他一个不理睬 b'. * 给他不理睬

这一事实对空范畴学说也是挑战,因为它会预测不需要“数量”成分也是合法的,即(18a'、b')都可以通过空名物化手段来实现名物化,但这显然是不对的。而量词观却能解释上述句法对立:之所以不能去掉数量成分,是因为量词在起关键的名物化作用⁴。

这里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在以上三条证据中,量词为什么不能是隐性的?原因其实很明显:隐性会造成不合法。先看证据一的情况。按照图3的结构,数词短语“很多”位于CIP的指示语结构上,当指示语与补足语VP都显性表达时,结构的中心语CI必须出现;语义上,数词也不能直接与VP搭配,必须借助于显性量词⁵。正是这两个原因,让“很多”后的量词必须出现。再看证据二和三,同样道理,如果量词隐性造成表层结构不合法,那就必须显性出现。动词“有”、“给”作为中心语都选择名词性成分做补足语,只有显性量词才能明确其后的VP名物化了⁶。因此,在“有+一点儿+小(不)A/V”格式和“给+NP+数量+VP”格式中,量词的显性出现具有强制性。而“NP的VP”结构不同,“NP的”位于DP指示语位置,是附加语,它没有次范畴选择能力。因此,“NP的VP”结构中的量词可以隐性存在。本文用量词的显性与隐性差别来解释上述现象,并不是“见招拆招”。恰恰相反,正是量词观才帮助我们发现了上述微观句法特征,空范畴理论对此无能为力。

证据四:苗瑶语量词的名物化功能。李云兵(2012)指出,苗瑶语有一部分苗语支语言的量词能与动词、形容词组合,构成“量词+动词”、“量词+形容词”,这两种结构属于名词性短语,如果不加指示词,它就是一个名词化了的动词或形容词,如例(19)-(20)(同上:297)。虽然对应的汉语翻译用“的”字结构,但苗瑶语的确是用量词来实现名物化。

(19) 苗语黔东南方言:

a. 量词+形容词

| | | |
|---|--|--|
| te ¹¹ lhu ³³ (大的那个) | | le ³³ cho ⁵³ (红的那个) |
| 个大 | | 个红 |
| tco ⁵⁵ ta ³⁵ (长的那个) | | taŋ ³³ tei ⁵⁵ (直的那个) |
| 条长 | | 根直 |

b. 量词+动词

| | | |
|--|--|---|
| te ¹¹ ta ¹³ (死的那个) | | te ¹¹ γə ¹³ (活的那个) |
| 个死 | | 个活 |
| le ³³ me ¹¹ (卖的那个) | | le ³³ əu ³⁵ (要用的那个) |
| 个卖 | | 个要 |

(20) 布努语布努方言:

量词 + 形容词

tuŋ²³² tɔ²²¹ 死的_{那只}

只 死

po⁴³ hiŋ³³ 高的_{那个}

个 高³³

| luŋ³³ ntɔŋ⁴³ 掉的_{那个}

个 掉

| ŋ tɔ²¹ shiŋ³³ 新的_{那件}

件 新

这两种名物化结构再与指示词“这”组合,就组成了限定词短语。语序上,名物化短语前置指示词,例如(19a-b)的苗语黔东南方言所示。实际上,把(21a-b)直译为“这个红”、“那条长”也是可以的。

(21) a. le³³ cɔ⁵³ noŋ³⁵

个 红 这

‘这个红的’

b. tɔ⁵⁵ ta³⁵ moŋ⁵⁵

条 长 那

‘那条长的’

总之,上述四条独立证据,加上第三部分所举的大量带量词的“NP 的 VP”例子,证明本文提出的量词观并非特设,也非纯理论假设,而是对语言事实的概括,有充分的语言事实支持。

5. 结语

本文在语言事实基础上,提出解释现代汉语“NP 的 VP”结构难题的关键是量词:该结构外部之所以呈名词性,是因为其中的量词在起名物化作用;结构内部依然呈动词性,是因为 VP 做量词的补足语,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本文的一个重要主张就是有显性量词与有隐性量词的结构是同一结构,汉语使用量词来实现 VP 的名物化,在功能上与英语使用 -ing 来实现名物化是相同的。四条独立证据进一步证明本文的方案并非特设,而是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本文的分析既在理论上优于前人提出的五种方案,揭示出更多显性和隐性的语言事实,同时也能更好地解释跨语言的共性和差异。

注 释

- 1 至于还有哪些量词都有名物化功能,需要更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另文详论。
- 2 除特别注明外,本文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中文系网络语料库(CCL)和北京语言大学语料库中心(BCC)。
- 3 匿名审稿人举了一些有双音节词的例子,如“很多忧伤”、“很多惆怅”、“很多求情”,认为还应该考虑到韵律因素影响。感谢审稿人的意见,使我们对该条证据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另外,“忧伤”、“惆怅”、“求情”到底是动词、名词还是名动词,在这个结构中也很难确定。而例(15)中的动宾短语不会有争议。
- 4 针对证据三,匿名审稿人指出“给你关怀”、“给你疼爱”、“给你爱”、“给你恨”似乎都能说。我们支持这一

- 观察。但我们认为“关怀”、“疼爱”、“爱”、“恨”在这里很可能都不是动词。比如在这个句式中,它们都不能受“不”否定,如“*给你不关怀”;用“曾经”修饰时需要增加“的”,如“给你曾经的关怀”,其余类推。这些特征与“这本书的出版”中的“出版”完全不同。后者能直接受“不、曾经”修饰。也与(18)不同。
- 5 在一些习语性表述或标题中,数词可以与VP直接组合,如“三进山城”、“二进宫”、“三打祝家庄”等,这些数词后是否存在隐性量词值得进一步研究。但这些特殊情况与本文讨论的一般情形有较大差别。实际上,名词也有类似情形。数词与名词结合必须有量词,如“*三书”、“三本书”,但一些习语性表达或成语中的名词前不要求量词必然出现(Zhang 2013: 32-33),如“三房两厅”、“四菜一汤”等。
- 6 王国栓、马庆株(2008)指出“有+VP”的中“有”可看作能愿动词,如“那女孩有来过吗”,与“有+NP”中的“有”不具有同一性。

参考文献

- Abney, S. 1987. *The English Noun Phrase in its Sentential Aspect* [D]. Ph.D. Dissertation. MIT.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M]. New York: Henry Holt.
- Carnie, A. 2013. *Syntax: A Generative Introduction* (3rd edition) [M]. Wiley: Blackwell.
- Cheng, L. & R.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J]. *Linguistic Inquiry* 30: 509-542.
- Cheng, L. & R. Sybesma. 2005. Classifiers in four varieties of Chinese [A]. In G. Cinque & R. Kay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C]. Oxford: OUP. 259-292.
- Huang, C.-T. J., Y.-H. A. Li & Y. F. Li. 2009. *The Syntax of Chinese* [M]. Cambridge: CUP.
- Kuno, S. & K. Takami. 2004. *Functional Constraints in Grammar*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ilsark, G. 2006. Gerundive nominalization [A]. In M. Everaert & H. van Riemsdijk (eds.).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yntax. Vol. II* [C]. Malden, MA.: Blackwell. 436-458.
- Pan, H. H. 1990. Head noun movement in Chinese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nd Northeaster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Philadelphia, USA, May 1990.
- Pan, H. H. 1998. Structur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noun phrases [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th North-American Conferenc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Boston, USA, June 1998.
- Tang, C.-C. J. 1990. A note on the DP analysis of Chinese noun phrase [J]. *Linguistics* 28: 337-354.
- Zhang, N. N.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Zhang, N. N. 2017. The syntax of event-internal and event-external verbal classifiers [J]. *Studia Linguistica* 71: 266-300.
- 陈 一, 2014, 说“有点小(不)A/V” [J], 《中国语文》(2): 157-161。
- 程 工, 1999, 名物化与向心结构理论新探 [J], 《现代外语》(2): 128-144。
- 邓思颖, 2006, 以“的”为中心语的一些问题 [J], 《当代语言学》(3): 205-212。
- 范 晓, 2009, 《汉语句子的多角度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郭 锐, 2002,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M]。北京: 商务印书馆。
- 郭 锐, 2017, 同形省略和离合词、不完整词形成机制 [J], 《语言科学》(3): 225-249。
- 胡裕树、范 晓, 1994, 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和“名词化” [J], 《中国语文》(2): 81-85。
- 黄正德, 2008, 从“他的老师当得好”谈起 [J], 《语言科学》(3): 225-241。
- 李行德, 1997, 语言发展理论和汉语儿童语言 [J], 《现代外语》(4): 58-91。
- 李艳惠, 2008, 短语结构与语类标记: “的”是中心词? [J], 《当代语言学》(2): 97-108。

- 李云兵, 2012, 苗瑶语量词的类型学特征 [A]. 载刘丹青、唐正大(编), 《名词性短语的类型学研究》[C]. 北京: 商务印书馆。286-305。
- 刘丹青, 2011, 语言库藏类型学构想 [J], 《当代语言学》(4): 289-303。
- 刘丹青, 2012, 汉语的若干显赫范畴: 语言库藏类型学视角 [J], 《世界汉语教学》(3): 291-305。
- 陆俭明, 2003, 对“NP的VP”结构的重新认识 [J], 《中国语文》(5): 387-391。
- 陆 烁、潘海华, 2013, 从英汉比较分析看汉语的名物化结构 [J], 《外语教学与研究》(5): 643-656。
- 潘海华、安丰存, 2012, 英汉名词短语核心句法层级结构比较研究 [J], 《外语教学与研究》(5): 658-670。
- 潘海华、陆 烁, 2013, *DeP* 分析所带来的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方案 [J], 《语言研究》(4): 53-61。
- 潘海华、叶 狂, 2015, 离合词与同源宾语结构 [J], 《当代语言学》(3): 304-319。
- 沈家煊, 2007, 汉语里的动词和名词 [J], 《汉藏语学报》(1): 27-47。
- 沈家煊, 2009, 我看汉语的词类 [J], 《语言科学》(1): 1-12。
- 沈家煊, 2016, 《名词和动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石定栩, 2004, 动词的名词化和名物化 [A]. 载张伯江、方梅(编),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二)》[C]. 北京: 商务印书馆。255-273。
- 石定栩, 2008, “的”和“的”字短语 [J], 《当代语言学》(4): 298-307。
- 石定栩, 2011, 《名词和名词性成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司富珍, 2002, 汉语的标句词“的”及相关的句法问题 [J], 《语言教学与研究》(2): 35-40。
- 司富珍, 2004, 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 *DeP* [J], 《当代语言学》(1): 26-34。
- 王国栓、马庆株, 2008, 普通话中走向对称的“有+VP+(了)”结构 [J], 《南开语言学刊》(2): 87-91。
- 熊仲儒, 2001, 零成分与汉语“名物化”问题 [J], 《现代外语》(3): 228-236。
- 熊仲儒, 2005, 以“的”为核心的 DP 结构 [J], 《当代语言学》(2): 148-165。
- 叶 狂, 2014, 句法共性理论与汉语句式研究 [D]. 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
- 叶 狂、潘海华, 2018, 离合词的句法本质再探 [J], 《当代语言学》(4): 605-615。
- 周国光, 2005, 对“中心语理论和汉语的 *DeP*”一文的质疑 [J], 《当代语言学》(2): 139-147。
- 周国光, 2006, 括号悖论和“的 X”的语感 [J], 《当代语言学》(1): 71-75。
- 朱德熙, 1980,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4, 关于向心结构的定义 [J], 《中国语文》(6): 401-403。

收稿日期: 2019-01-18; 修改稿, 2019-10-31; 本刊修订, 2019-12-09

通讯地址: 311121 浙江省杭州市 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Abstracts of papers in this issue

Non-canonical scalar implicatures, face/politeness considerations, and neo-Gricean pragmatics (p. 25)

Yan HUANG (School of Cultures,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Auckland, Private Bag 92019, Auckland, New Zealand)

One of the politeness strategies, which has recently been observed, is the use of a semantically weak scalar expression to implicate the meaning of one or more of its stronger alternatives in a face-threatening context—speech situation in which a loss of face can potentially be induced for the addressee, the speaker or both—out of politeness concerns. I call this type of marked scalar implicatures ‘*non-canonical scalar implicatures*’.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formed discussion of the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a few languages and presents a new analysis of it within the neo-Gricean pragmatic framework.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 and its psychological reality (p. 40)

ZHANG D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This research adopt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itted on richly annotated corpus data to investigate the constraining factors of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 and their effect sizes. Conditional inference tree and random forest models are also utilized to analyze the multiple interaction effects between constraints and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In addition, a forced choice task experiment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examine the psychological reality of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s such as discourse accessibility, length difference, pronominality, definiteness, animacy and concretenes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constructional choice of English dative alternation, and there exist high-order complex interactions between accessibility, length difference, pronominality and definiteness.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can reflect and predict native speakers’ constructional choic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erformance of dynamic categorization of word meaning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anguage (p. 53)

ZENG R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Dynamic categorization refers to the immediate change or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semantic categories at the lexical, sentence and discourse meaning level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etaphor, metonymy, base/profile and other working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ynamic categorizatio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of dynamic categorization of word meaning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language, so as to make a reasonable interpretation of its derivations. It is found that, at the word meaning level, this categorization is all about lexical features and relations. At the sentence level, it is mainly about categorization of grammatical terms and the structural relationships. At the level of discourse, it is chiefly about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evaluation meaning.

A classifier-as-nominalizer approach to the “NP de VP”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p. 64)

YE Ku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on the analysis of “NP de VP”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due to the difficulties involved in accounting for the fact that this construction disobeys the principle of endocentricity. From a syntactic universal perspective, we observe that a

handful of classifiers, such as *zhong* (sort) and *ci* (time) can occur in this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zhe ben shu de liang ci chuban* (this book's two times of publication). Based on this fact, we argue that “NP de VP” construction is actually a covert form of the “NP de + determiner + Numeral + Classifier + VP” structure. Classifiers should be overtly spelled out, as in the example above, when either the determiner or the numeral, or both of them, is/are overt. Importantly, we argue that the classifier's selecting VP as complement in Chinese behaves much the same as -ing's selecting VP as complement in English (see Abney 1987), both of which are the canonical syntactic operations of gerundive nominalization. Accordingly, the alleged violation of the endocentric principle can be successfully explained away. To further support this analysis, four pieces of independent evidence are provided, demonstrating that our proposal is a legitimate generalization based on facts, more convincing than previous accounts, such as the null nominalizer hypothesis.

Pronoun ambiguity resolution in English sentence processing: Evidence from eye-tracking (p. 77)

TANG Huijun & WEN Xu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mbiguity resolution has been intensively discussed in the field of psycholinguistic research, which includes different types of ambiguity such as lexical, syntactic, anaphoric ambiguities. In the current study, an eye-movement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how readers processed gender-ambiguous and -unambiguous pronouns. In early processing, first-pass fixation probabilities for unambiguous pronouns referring to the object in the preceding sentence were higher than for ambiguous pronouns. In later processing, after reading ambiguous pronouns, participants spent more time rereading the semantically informative parts of the text than after unambiguous pronouns. The results support a model of pronoun resolution which claims that early processing of pronouns is effortful when the processor has to disengage from a salient discourse entity that is incongruent in gender. Later processing is difficult when two possible interpretations of a pronoun compete for integration into the context. The findings provide evidence against the competition model and the reanalysis model of pronoun resolution.

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of English temporal and spatial adverbial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L1 conceptual transfer (p. 90)

LI Xij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LIU Yongb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learner corpu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rdering distribution of English temporal and spatial adverbials of Chinese EFL learners and L1 conceptual transfer. It was found that the positioning of both L2 temporal and spatial adverbials in sentences was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L1 conceptual transfer. Specifically, L1 influence on temporal adverbials wa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an that on spatial ones. The plausible reason is that English spatial adverbials predominantly occur in the final position and therefore assume greater syntactic salience, which can contribute to SLA on the one hand and help cushion L1 influence on the other. In addition, compared to L2 writing, L1 transfer had significantly stronger influence on L2 speaking in the use of temporal adverbials, while the same case did not apply to spatial adverbials. The former result could be interpreted in light of L2 learners' different degree of access to implicit knowledge and explicit knowledge, and the latter result presumably further demonstrates the role of input frequency and syntactic salience in enhancing SLA and constraining L1 influence.

The effect of pragmatic expectations about optimal informativenes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L2 referential expressions by advanced Chinese EFL learners (p. 103)

WU Shiy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Using a moving-window technique, the present study carried out three experiments to examine how Chinese EFL learners at the advanced level were affected by the expectation of “optimal informativeness” during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referential expressions.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s